

环境传播的修辞机制

王丽娜

摘要: 随着建构主义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 环境传播也开始采取社会一符号的建构视角, 被表征为社会运用符号进行的对环境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意义表述与争夺。这事实上是一种修辞学的取向, 可以被表述为环境修辞。当下, 无论在学术还是实践层面, 环境修辞都已经成为环境传播中最重要的取向之一。本文以修辞学理论为基础, 尝试回答环境修辞的一个元问题, 即环境传播与修辞之间的关系性。进而本文首先从西方修辞学两种基本的修辞观入手, 搭建环境传播与修辞之间的关联机制; 然后通过分析“修辞结构”这一意义生产的修辞语言, 探究环境修辞的意义机制; 最后从艺术性、效果、伦理性三个维度建构环境修辞的批评机制, 以期对环境修辞搭建一个相对完整的修辞学分析框架。

关键词: 环境传播; 修辞机制; 修辞观; 辞格; 修辞结构; 修辞批评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9)04-0114-14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9.04.010

一、引言

作为传播学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尽管环境传播的学术起点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 并在新世纪初获得其学科合法性和独立性, 但环境传播的实践之路却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美国的环境运动——当然,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诞生之初。事实上, 无论是学术历程, 还是实践路径, 环境传播都有一个从狭义走向广义、从“媒介”走向“沟通”、从“问题”走向“语境”、从环境议题走向环境生态、从环境表达走向环境民主、从“功能主义”走向“建构主义”^[1]的转变与发展过程。

在建构主义维度下, 环境传播被表述为以生态环境为基本话语出发点, 不同社会主体围绕环境议题而展开的文本表征、话语生产与意义争夺实践^[1]。这种理解事实上为环境传播框定了符号、意义、话语等“问题域”。而修辞正是“通过象征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的一门实践”^{[2](P2)}。同时, 无论是语言还是符号, 其作为象征手段总是指向一个“不在场”的事物或观念, 继而再现或置换这个“不在场”之物——也就是说, 修辞实践对象征手段的征用就是一个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起意义关联的过程。因此, 如何回应上述问题, 直接指向了修辞学的相关经验和知识。

基金项目: 云南大学一流大学创新团队项目“民族传播研究与媒体人类学”

作者简介: 王丽娜,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 650000), 西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云南昆明 650224)

尽管实践层面的环境传播都必然蕴含着修辞的逻辑，但学理层面对环境修辞^①的关注与研究却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一般认为，克里斯蒂娜·奥兰沃克于1980年代初在《演说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上发表的多篇探讨环境运动的文章，揭开了环境传播的修辞学面纱^[1]。随后，西方环境传播研究开启了向修辞学转向的全新学术轨迹。现在，探究环境传播的修辞与叙述的环境修辞研究已经日益发展成为环境传播知识图谱中一个显著且核心的领域^[3]。而国内尽管起步较晚，但在刘涛、郭小平等学者的带动之下，近几年也陆续涌现出一些研究成果^②。

纵观这些研究，可以大致概括为三大学术景观：环境修辞的文本研究，环境修辞的理论研究和环境修辞的社会属性研究。

其中，文本研究主要剖析环境文本的呈现元素和象征元素，即环境文本在物理构成方面的形式和在内涵构成方面的意义、寓言等。需要指出的是，环境传播中的文本不仅指向新闻媒介报道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包括环境运动和视觉事件^[3]。比如美国著名环境传播学者罗伯特·考克斯在分析环境修辞的符号形式时，重点关注了多丽丝·格雷伯提出的凝缩符号(Condensation Symbol)^{[4](P78)}。西德尼·多布林和肖恩·莫雷在《Eco-se: 图像、修辞与自然》一书中系统研究了环境传播实践中对空间、环境、生态和自然进行视觉表征的符号系统，并指出这些系统包括图片、绘画、电视、电影、游戏、电脑媒体等^{[5](P2)}。可见，环境视觉修辞符号本质上体现出一种“多模态”特征。刘涛指出环境抗争活动中底层话语的符号实践体现为对一切可能的符码体系进行符号化处理，尤其是对被罗兰·巴特称之为“刺点”(Punctum)的符号的征用^[6]。此外，也有学者对环境传播中一些重要的意指概念，如“自然”^[7]、“平衡”^[8]、“安全”^[9]、“健康”^[10]、“温室效应”^[11]等的意义流变过程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理论研究一方面致力于借助修辞学理论话语建构或发展环境修辞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由于环境修辞实践具有高度的情境化特征，因此结合不同的修辞语境总结并建构修辞主体各自特定的修辞策略及修辞资源，成为这个研究向度的重要学术旨趣。比如约翰·戴利克斯和凯文·迪卢卡在《图像事件、公共领域与争议性实践》中指出，环境激进主义组织的视觉修辞策略就是制造图像事件，从而在图像意义上生产公共议题、展开公共辩论^[12]。史蒂芬·施瓦策通过对公共广播公司(PBS)拍摄的纪录片《商业秘密》进行分析，指出环境情景剧这种全新的修辞体裁能够“引发社会行动者之间强烈的、两极分化的差别，并在这些差别中灌输道德的严肃性与悲悯的情怀”^{[13](P239)}。郭小平对环境传播中所使用的“委婉语”修辞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这些具体的委婉语修辞策略：置换环境风险议题、洗绿、片段式新闻框架、模糊语言使用在掩饰与弱化生态风险的后果，以及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中的作用^[14]。刘涛则为环境传播建构了一个由“意指概念”、“语境”、“隐喻”、“意象”和“接合”等五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修辞形式和修辞实践共同搭建的修辞学理论框架^[15]，并且又在后续的研究中对五种修辞机制进行了详细的理论探讨^{[16][17][18][19][20]}。刘景芳等围绕百名诺奖得主与绿色和平组织关于转基因作物“黄金大米”之争事件，从文本分析中概括出哀诉修辞法这样具体的修辞策略^[21]。胡颖君则指出了环境邻避运动中抗争主体的修辞武器包括我们与他者的建构、环境议题与社会议题的勾连、体制内的反抗、摆脱邻避自利化标签等四种方式^[22]。

而随着环境修辞研究的深入，环境的社会属性、环境同各种社会结构性要素的勾连、环境对社

^① 如前所述，在建构主义维度下，环境传播就是社会运用符号进行的对环境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意义表述与争夺。而修辞的实质正是借助语言和符号等象征手段进行意义的表征、置换或激活。因此，环境传播向建构主义的转向可以理解成一种修辞学的转向。在这里，为了表述的简洁，本文统一将修辞学取向的环境传播称为“环境修辞”。同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对环境修辞的研究并非针对某一具体的修辞现象，而是力图从整体层面把握环境修辞这样一种传播取向。

^②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下一段的内容，这里不再介绍。

会机制的运行和社会秩序的架构的影响逐渐得到了认识和认可。于是环境修辞研究被置于一个更广大的社会关照体系之中，特别是在修辞与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和勾连中审视环境修辞议题。比如迪卢卡在《图像政治：环境激进主义的新修辞》中将环保主义者通过生产“图像事件”这一环境修辞文本而引发的社会或政治运动或变革称为“图像政治”^[23]。约翰·德莱泽克在《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一书中概括了环境公共领域中的九种话语类型：生存第一主义；普罗米修斯主义；行政理性主义；民主实用主义；经济理性主义；可持续发展观；生态现代主义；绿色激进主义；绿色政治观^[24]。刘涛则按照哲学建构（生存理性/工业理性）和秩序思辨（改良主义/激进主义）两个维度将环境话语分为生存极限主义、生态理想主义、绿色激进主义、生态现代主义四种类别^[25]（P146）。此外，也有学者致力于与环境话语相对应的反话语或对抗性话语研究。比如坎特和马斯卢克从底层“身份”、“权利”与“距离”的角度出发，开创性地探索环境反话语视野中的“草根政治”理念^[26]。

然而，尽管上述研究带来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但是也不乏一些遗憾：一方面，这些讨论往往以传播学、符号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为主要学科视角，反倒忽视了环境修辞应该关注的元领域——即修辞学本身；另一方面，似乎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元问题被忽略了：这就是环境传播与修辞之间的关系性问题。也就是说，既然环境修辞指向环境意义的表述与生产，是一种修辞学取向下的环境传播，那么，这种传播取向的依据是什么？实质是什么？又应该如何理解和把握其实质？显然，上述问题不仅是在探讨环境修辞时应该首先回应的内容，而且尤其需要从环境修辞的理论元点——即修辞学中寻找答案。有鉴于此，本文以修辞学理论为基础，首先借助于西方修辞研究中两种基本的修辞观搭建环境传播与修辞之间的关联机制；然后从“修辞结构”这一修辞的语法入手探究环境修辞的意义机制；最后，沿着修辞批评的路径，从艺术性、效果和伦理性三个维度建构环境修辞的批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三种修辞机制的逻辑关系做适当阐释。最终，在上述三个维度的修辞机制建构中编织出环境传播与修辞之间的关系网络，使二者的互动与对话能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环境传播学框架中展开。

二、环境修辞的关联机制

探究环境传播与修辞之间的关联性究竟何在，换句话说，环境传播向修辞学转向的依据是什么，是环境修辞研究的起点。一般来说，西方修辞学以20世纪为界，大致经历了古典修辞学和新修辞学两个大的发展时期。这两个不同阶段主导性的修辞观念分别是“说服”和“认同”^[27]。在笔者看来，正是“说服观”和“认同观”这两种基本的修辞观同环境传播所具有的实践性和公共性特征的内在契合，使二者能够在一个共同的场域展开对话与互动。

（一）“说服观”与实践性

在被公认为西方修辞学奠基之作的《修辞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将修辞界定为“一种能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法的功能”^[28]（P24）。可见，自亚氏伊始，修辞就被嵌入了一个明确的劝服结构，修辞与说服之间被划上了约等号。同时，从古典到现代，尽管对修辞的认识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但“说服观”始终作为修辞学的一个核心命题被保留和延续着：帕特里夏·毕泽和布鲁斯·赫茨伯格在《修辞传统：从古典到现在》一书中就反复强调当代修辞学涵盖“劝说”、“劝说效果”、“公共动员”、“有效的演说策略”等范畴^[29]（P1）。

如果说说服奠定了修辞学的基本内核，那么，如何说服便成为修辞学必须回应的问题。尽管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定义暗指修辞策略并无定论，但众所周知的是，西方修辞学发端于古希腊时代的演说传统，而演说中演说者可使用的修辞手段正是语言和各种符号，因此，象征性符号成为修辞必然

的说服工具。而如前所述，象征是一个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起意义关联的过程，也就是说，说服建立在表征和意指实践这个最基本的象征表达机制之上。因此，“说服观”视阈下的修辞，其实质就是借助语言和符号等象征手段来进行的意义表征、置换或激活，从而实现“说服性话语”生产的实践活动，不仅具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而且是一种“软性的”或“非暴力的”说服方式——按照布尔迪厄的理解，这就是一种经过修辞美化的象征权力^①。

回到环境传播。应该说，环境传播的学术出场本身就是对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性生态环境危机的回应。正是这样的“现实之维”，从诞生伊始，环境传播便被赋予了浓郁的实用主义向度，强调借助大众媒介的作用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推动环境保护。因此，环境传播既是一门知识，更是一种实践，需要从方法层面对其实践性进行思索和回应。而这里的方法显然指向能够促进传播实践达成的各种手段和途径，具有显在的说服意图。于是可以说，在实践性这样一个维度上，环境传播指向的正是修辞所强调的说服力。

但是，真正促使环境传播同修辞深度融合的，却是其在实践中面临的一个很难逾越的困境——这就是“态度—行为沟”（Attitude-Behavior Gap）问题^[30]。所谓“态度—行为沟”，简单来说，就是公众对环境的认识是一回事，但对环境的态度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并不一致。公众可能就环境议题形成某种认识或倾向，但却很难改变他们的行动。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很多环境问题往往是不可视的，很难在公众那里引发紧迫感和危机感；二是公众对环境的关注总是被特定环境事件所驱动——即安东尼·唐斯提出的“议题关注周期理论”^[31]，从而导致环境在公众那里难以形成持续的注意力；三是对环境问题的科学研究或政府发布被置于了不确定的争议之下，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致力于软性说服的修辞便成为环境传播消解“态度—行为沟”的有力武器。也就是说，环境传播要想真正实现其实用价值，就必须甚至唯有借助附着于修辞之上的“象征性权力”。具体来说，就是借助语言和符号来发掘、表征、生产出环境或人与环境关系的意义，从而在意义的赋值与接受之间搭建起象征性过渡与连接，最终在修辞的“乔装打扮”中以一种隐性的、匿名的方式达到说服性效果的生成。

这种从修辞应用回应环境传播的实践属性的全新认识在考克斯于2006年为环境传播所界定的一个最为学界认可的、也是最具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概念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考克斯认为，环境传播是我们理解自然，以及理解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实用性工具和建构性工具。就实用主义维度而言，环境传播旨在教育、警示、说服并帮助我们解决环境问题。就建构主义维度而言，环境传播是象征性媒介，创造了意义，帮助建构或组成我们理解的自然和环境问题。在他看来，自然的不同画面或者建构使我们既可以把森林与河流看作用来使用或开发的对象，也可以把它们当作生命系统的必要支持和需要被保护的對象^{[4](P21-22)}。显然，这个定义中所说到的建构主义维度正是本文所讨论的环境修辞的范畴。考克斯自己也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对环境传播的理解直接汲取了美国著名修辞学家康尼斯·伯克所提出的“象征性行动”的观点^{[4](P21)}。在伯克那里，象征指向人类行为的符号性特征，行动则意味着符号行为具有的动机性。因此，考克斯认为环境传播是象征性行动，意味着在他的理解中，环境传播实用性功能的实现必然伴随着建构性功能的展开和作用的观点。也就是说，环境传播蕴含着一个从动机——符号——意义——意识——行动的传播机制——这无疑上文所述及的环境传播与修辞的关联所在。换句话说，任何环境传播实践都将被还原为一个修辞命题

^① 布尔迪厄在《语言和象征权力》一书中指出，象征权力就是一种符号权力，强调通过语言的方式达到说服的修辞目的。他认为，当人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遭受来自语言的支配、挟持和摆弄，而且“心甘情愿地充当语言的共犯时”，象征权力就已经发挥作用。

加以阐释。事实上，在新社会运动^①那里，环境传播就被直接理解为一场与修辞和话语相关的文化活动。

（二）“认同观”与公共性

康尼斯·伯克是“认同观”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他认为“认同”（Identification）应该取代传统的“说服”成为修辞学的核心概念，因为“说服”必须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之上：“只有当我们能够讲另一个人的话，在言辞、姿势、声调、语言、形象、思想等方面做到和他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同于这个人的言谈方式时，我们才能说得动他……通过遵从受众的‘意见’，我们就能显露出和他们一体的‘征象’（Signs）……遵从他们的许多意见为修辞者提供了一个支点，使得他可以撬动受众的另外一些意见。”^{[32](P55-56)}

由于对修辞效果的关注，伯克认为“认同”不仅应是修辞的目的，更是修辞的策略，并明确提出了修辞实践中三种“认同”策略：同情认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和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其中，同情认同是指借助情感化的修辞叙事来引发情感共鸣——这事实上也是情感社会学重要的研究“问题域”；对立认同是指建构出共同的敌人，从而实现社群内或跨社群的凝聚与团结；误同则是一种“虚假的认同”，即在一种虚假的现实置换中实现认同生产^{[33](P161-163)}。

应该说，伯克这种将认同视为策略的观点勾连出修辞学全新的学术想象力，极大地拓展了修辞学的生命空间，其最有价值的应用领域便是在面对具有冲突性的公共议题时，如何通过象征手段在不同争议主体之间编织一条“沟通之维”，促使彼此展开协商、对话与交流，并最终实现共同理解——而这恰恰是环境传播迫切需要回应的问题。毫无疑问，环境命题是一个典型的公共性话题。按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观点，由于环境风险已成为风险社会中典型的、基础性的风险形态^[34]，因此，回应环境风险的环境传播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公共传播，其实践果实必然是普遍的公共性——即环境公共议题的建构，环境公共舆论的生产，环境公共行动的激活，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等。

具有鲜明公共性特征的环境传播的发生场域是考克斯所谓的环境公共领域。他将公共领域界定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领域，由传播中彼此相关的不同个体构成。他们通过谈话、讨论，甚至争论、质疑等方式交流，探讨着共同关心的问题。同时，只要个体和他人对话或者争论，私人的担忧转化为公共话题，关于环境的环境公共领域就产生了^{[4](P28)}。然而，正如考克斯指出的那样，在环境公共领域中，活跃着七种不同类型的声音：媒介、公众、政府、企业、环保组织、科学家、反环境主义者^{[4](P31)}，因此，不同发声主体之间必然存在着环境意义的争夺与对抗，以期使自己的环境话语^②成为其中的主导力量。以美国环境运动历史上四次主要的思潮：“环境保护主义”与“生态保育主义”，“主流环境运动”（主要聚焦于人类健康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环境正义运动”，以及“全球环境主义”^[35]为例，其各自的环境话语就各不相同。就早期的“环境保护主义”与“生态保育主义”而言，为向开发自然的传统主导观念发起挑战，荒野保护与美国人民的民族身份这一政治话语或自然所带来的崇高审美体验这一诗意话语结合起来；而在“主流环境运动”那里，环境污染与环境问题被置于人类健康与生存威胁这一公共话语之下；到了“环境正义运动”，环境议题开始更多

^① “新社会运动”是由罗伯特·S. 凯瑟卡特、迈克尔·C. 迈克吉、克劳斯·奥菲等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修辞学角度对社会运动提出的全新注解。这些新兴社会运动主要包括环境运动、女权运动、公民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主要特征是以非暴力的修辞方式实现社会意识的集体转型，进而间接地推动相应的政治改革和政治运动。因此就其实质而言，新社会运动就是一场修辞运动。

^② 关于环境公共领域中的环境话语，参见前文对约翰·德莱泽克和刘涛观点的介绍。

地与社会议题或政治议题关联在一起，环境被置换在种族、阶层、性别、民主、公平等政治话语之下；而时下方兴正艾的“全球环境主义”，环境则与第三世界、全球正义与公平等话语勾连在一起。由此可见，环境问题并非是一个静态的、单纯的生态学命题，它承载着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意义；而环境传播也并非一个简单的、纯粹的传播学命题，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权力之维。

因此，在一个如此多元且复杂的环境公共领域之中，环境传播要想真正实现其公共性，在修辞“认同观”维度上利用象征手段编织以公共利益为基本诉求的环境公共话语，从而在象征庇护下促使不同“声音”实现环境议题的多元协商和共识再造便成为最切实可行的一条路径。

事实上，环境传播中对认同的修辞构造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基本诉求的公共话语的生产，其本质体现为一种公共修辞策略（Public Rhetoric）^[27]。而按照考克斯对环境传播的进一步理解：“环境传播是旨在构建良性环境系统和培育健康伦理观念的危机学科”^[36]，那么，这种公共修辞理念也是和环境传播的伦理目标——建构“生态共同体”（Ecological Community）不谋而合的。“生态共同体”是一个从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维度所构造出来的概念。其中，“生态”对应于挪威哲学家阿恩·纳什提出的“深度生态学”的命题，是一种生态整体主义（或曰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思想，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因此所有生命享有和人类同等的道德待遇^[37]。“共同体”则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中借鉴而来。尽管是一种想象的形式，但这种特殊的文化人造物却是维系认同的根本性文化力量^[38]。可见，“生态共同体”就是指一种源于对普遍的生态伦理的敬畏与守护，对“生态公民”（Ecological Citizen）的想象与认同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的想象性群体。这个共同体缝合了因不同地域、种族、阶层、性别等因素而导致的环境话语的天然区隔，具有强大的效力与作用力。显而易见的是，“生态共同体”是在生态伦理的意义生产和表征之下建构出来的，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修辞形式。换句话说，是修辞“认同观”在环境公共传播中的一次典型操演。

三、环境修辞的意义机制

应该说，上一部分对环境传播与修辞之间关联机制的探讨为环境修辞提供了合法的起点，环境传播得以在一个修辞学的范式中展开学术认知和行动实践。而如前所述，环境修辞的实质就是借助象征符号生产或争夺环境意义，从而实现“说服性话语”或“认同性话语”建构的实践活动，因此，生产意义的意指实践过程成为环境修辞的核心所在。事实上，环境修辞研究的三种学术景观，“文本”、“理论”、“社会属性”都存在一个从符号到意义的意指逻辑：“文本”本身就是研究符号形式及其意义赋值的问题；“理论”中强调的修辞策略，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象征性行动”，都需要还原到修辞意义中加以阐释；而“社会属性”则完成了一个跨域的符号表征和意义置换。因此，接下来显然有必要对环境修辞的意指实践过程展开讨论。由于既有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意指实践的过程或结果，而尽管笔者同样认可环境修辞的最终落脚点必然指向环境意义本身，但是，对意义内涵的理解却需要建立在意义是如何被生产出来这个更为本质性的元问题之上。毕竟，环境意义是一个高度情境化的、动态的、变化的事物，而意义的生产机制却是一个附着于意指实践深层的、静态的、稳定的结构。而一旦要深入阐释环境修辞的意义机制，修辞学中对“修辞结构”这一勾连符号和意义的修辞语法的讨论便不失为一种可行且不错的切入视角^①。

按照国际符号学权威期刊《符号学》主编马塞尔·德尼西观点，任何符号意义都是在“修辞结

^① 也就是说，这部分内容不是要去讨论环境修辞的具体形式、策略或意义等微观层面的内容，而是力图去回应环境修辞的意义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个更为本质性、也更为宏观的问题。同时，由于本文的切入视角是修辞学，因此对问题的回答采取了修辞结构这个修辞学的理论。

构”这一修辞语法中得以生成。所谓“修辞结构”，是指语言和符号的编码系统，意义正是以某种“伪装”的编码形式存在其中^[39]。可见，“修辞结构”是修辞学层面的意义装置。因此，要想识别修辞实践中的意义，关键就是要对修辞文本的“修辞结构”进行解码处理。同时，在德尼西看来，“修辞结构”并非一个抽象的事物，而是对应于隐喻、转喻、越位、反讽、寓言、象征等具体的修辞形式^[39]。而正是这种理解，使“修辞结构”可以被还原到“辞格”这个修辞学中最基本的议题中加以讨论。换句话说，探讨修辞的意义机制，其实质就是要揭示“辞格”的工作原理。

从古典修辞学伊始，辞格就在修辞学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辞格成为了修辞最具代表性的成分，是修辞精髓的基础和体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辞格已经成为了修辞的别名，二者之间已然融为一体。一般而言，西方修辞学在发展进路中尽管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辞格，但较为公认的四大“主辞格”分别是隐喻(Metaphor)、提喻(Synecdoche)、换喻(Metonymy)^①和反喻(Irony)。简单来说，隐喻就是用一种事物来说明另一个事物；提喻则指整体与部分之间或种与类的互相替换；换喻是用具体、有形、可感知之物来替代抽象、无形、难以捉摸之物；反喻则是表达与字面不一致的意义，即所谓的“反语”或“反话”。

当然，上述对辞格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最浅层的表面，且这种理解也无助于真正揭示出辞格的意义机制。因此，有必要深入到辞格内部，剖析其深层次的特征。这个时候，还是康尼斯·伯克，他富有开创性地提出的“修辞格其实有两套名称”的观点为我们理解辞格的工作逻辑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在伯克看来，四种主辞格其实是游弋于喻意和实意——或者比喻和非比喻之间的。在比喻性语境中，它们被称为隐喻、提喻、换喻、反喻，并以修辞者耳熟能详的“常用名”(Customary Names)发挥自己的功能；但是，当它们在非比喻的现实情境中被运用时，却“改头换面”，以另一套虽然人们不会觉得陌生但几乎不可能引发有关辞格联想的名称大行其道。于是，隐喻被改名为“观点”(Perspective)，提喻为“表述”(Representation)所替代，换喻被称为“简约”(Reduction)，而反喻变成了“辩证”(Dialectic)。

同时，伯克进一步指出了这四组词汇：观点/隐喻；表述/提喻；简约/换喻；辩证/反喻之间为什么能形成对应或置换关系：首先，隐喻是从一个特征体出发描述另一个特征体，这就意味着修辞者是在从充当喻体的特征体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充当主体的特征体，也就是说，是在提出一个关于主体的新观点。因此，隐喻和观点具有同一性。其次，提喻是整体与部分，或种与类的相互转换。在这里，理解提喻的关键是事物之间的相互替换。而表述一词通常意味着不同事物和状态的相互替代或描述。按照这一理解，提喻和表述显然是同义的。再次，换喻是用具体代替抽象，有形替代无形，而简约恰恰也是将一个较为高级或复杂的存在领域的词汇以一个较低级且不那么复杂的存在领域的词汇表达出来——这正好也符合换喻的特征。最后，反喻和辩证的共同之处在于相互矛盾的成分在其结构中的对立统一。也就是说，反喻旨在通过字面和实意之间构建起一个既不协调、却又浑然一体的关系，从而将相互冲突的对立面联结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毫无疑问，辩论的基本模式是在正论和反论对抗的基础上建立起合论，自然二者之间可以建立起关联^[2]。

显然，伯克对辞格的理解已经使辞格从单纯的修辞手段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了一种人类的认知和思维模式。这事实上也对应于认知语言学先驱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对隐喻的理解。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莱考夫和约翰逊同样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修辞学意义上的一种辞格形态，而且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们认识事物、建立概念系统的基本认知方式^{[40](P5-6)}。尽管二位学者这里只提及了隐喻这一种辞格形式，但由于在他们的理论观点中，提喻、换喻和反喻都纳入到隐

① 换喻(Metonymy)也被称作转喻。

喻的范畴体系，因此可以说他们同样认可提喻、换喻和反喻是一种认知方式。此外，罗曼·雅各布森、热奈特、詹姆斯·弗雷泽、拉康、克里斯蒂安·麦茨等学者都沿着不同的理论路径将转喻^①和隐喻推向了更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思维甚至无意识工作的起源与方法问题^[18]。

总之，上述讨论说明隐喻、提喻、换喻、反喻四种主辞格都存在一个认知之维，且四者的思维逻辑分别是观点、表述、简约、辩证——这正是“辞格”这一“修辞结构”是如何生产出意义的基本工作原理。

在厘清了作为“修辞结构”的辞格的意义机制后，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环境传播。显然，任何环境修辞实践的意义生产都可以还原到观点、表述、简约、辩证的认知逻辑中加以阐释，并最终还原到辞格这一基本的修辞语法中。因此，对环境修辞而言，辞格有着极其特殊且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不少研究中被认为是环境修辞的修辞策略，更成为了环境修辞的意义装置，环境的意义就封装于其中。

接下来，我们不妨以环境修辞三种学术景观中涉及的一些研究内容为例，对其意指实践过程的修辞逻辑展开分析和理解，从中窥探环境意义得以生产的修辞语法。如前所述，在“文本”研究中，“凝缩符号”和“刺点”是环境议题建构和环境动员中最常使用的符号类型。按照多丽丝·格雷伯在《语言行为与政治》中对“凝缩符号”的研究，凝缩符号就形式而言既可以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术语、词语或人物，也可以是典型的图像符号，其共同特征是能够激起公众“对最基本的价值取向的深刻印象”^{[41](P289)}。也就是说，凝缩符号中往往蕴含着特定的价值立场，并且能使接受者按照这个既定预设形成认知效果。比如各种北极熊为生存而挣扎的图片——要么站在即将融化的冰面上，要么被淹死在北冰洋里，要么则是一张枯竭的熊皮，就已经成为了全球变暖最强有力的凝缩符号。由此可见，凝缩符号就是一种观点的表达，可以在隐喻的维度理解其意义生产。至于“刺点”，罗兰·巴特在《明室》中指出“刺点”是一种说不出名字的“刺激物”，但却携带着让人“十分明显的慌乱的征兆”^{[42](P96)}。可见，“刺点”是能够打破平衡的符号结构的某些反常的、突兀的、冲突性的符号形式。由于“刺点”同整个符号结构极不协调，能够在对立、矛盾中将意义的生产引向原本稳定、平衡的意义之外，从而实现了正一反两方面对意义的合力建构——这无疑对应于意义的辩论/反喻机制。在环境修辞实践中，“刺点”被经常性地运用到环境抗争运动中。

而在“理论”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涛专门针对环境传播提出的修辞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强调环境修辞应从“意指概念”（Ideographs）、“语境”（Context）、“隐喻”（Metaphors）、“意象”（Images）、“接合”（Articulation）这五个相互关联的修辞形式入手。其中，意指概念就是意识形态借以发挥作用的政概念或术语载体，比如“民主”、“自由”等。因此，作为一种修辞符码，意指概念具有和意识形态同等的效力。同时，由于任何一种文本符号都不可避免地携带了大量的社会规定和关联信息（即伴随文本），因此作者特别强调理解文本意义时需要发现原文本与伴随文本之间所搭建的语境关系——也就是所谓的伴随文本语境或文本间性。隐喻则是将两个事物放在一个并置的结构关系中，从一个概念领域去把握另一个概念领域。意象就是表“意”之“象”，强调意与象的结合。而文化意象则类似于荣格所谓的原型，也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显现。至于接合，就是建立事物与事物、符号与意义，特别是意义与话语之间的关联性或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了五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关系^[15]。

我们同样可以对五种修辞形式的意义机制进行一番分析。由于刘涛已提及隐喻，这里不再述及，主要分析其他四种修辞实践。显然，“意指概念”对应于观点/隐喻。由于观点界定了环境话语

① 同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观点不同的是，这些学者则认为提喻、反喻都应该属于转喻（换喻）的范畴。

的基调,因此应该成为环境传播中必须争夺的首要领域;“语境”中的伴随文本正好可以对应辩证/反喻,也就是要将与文本有关的所有其他文本——当然彼此之间可以是不一致的、也可以是一致的,置于一个整体视角之下思考,从而在文本与伴随文本的“辩证”中实现文本意义的合力建构;“意象”则毫无疑问地同简约/换喻形成勾连,从而以一种简单的、却是最具文化认同的原型激活的形式实现意识深处的说服效果;最后,“接合”则可以对应于表述/提喻,也就是建构起不同事物或状态的相互替换——或者进一步明确为符号与意义之间、意义与话语之间的关联性。

最后来看“社会属性”领域的研究。如前所述,这一学术景观缘起于对环境社会属性的认识。也就是说,环境的意义是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社会结构性要素勾连在一起的。这些结构性要素成为了环境意义的社会语境。而从环境意义到社会意义,环境的意义事实上实现了跨域置换。按照上文提到的莱考夫的观点,隐喻中的喻体和本体分别隶属于两个不同的“认知域”(domain),因此隐喻发生的思维逻辑是“跨域映射”(Cross-domain Mapping)^{[43](P203)}。由此可见,借助修辞赋予环境以文化逻辑和社会逻辑本身就是一种隐喻思维。同时,由于环境的意义往往还会被勾连并置于特定的话语陈述体系中,进而“以话语的方式”赋予某种环境意义以合法性和正当性。而按照福柯的观点,话语首先是由知识生产出来的,同时,话语为实现合法性和排他性,又必须使其得以生成的知识或文化具有再复制、再生产的可能性^[44]。而知识毫无疑问是一种特殊的观点,因此,环境话语中的意义生产同样可以在观点/隐喻的机制中还原其意义的语法逻辑。

总之,正是由于隐喻、提喻、换喻、反喻等辞格激活了一个认知—联想机制(Cognitive-Associative Processes),从而使隐匿在象征符号之中的暗指意义得以通过观点、表述、简约、辩证等思维形式得以体现——这正是环境修辞的意义机制的实质所在。

四、环境修辞的批评机制

在前两个部分,本文已经就环境修辞的关联机制、辞格作为环境修辞的意义生产机制等内容进行了讨论。这事实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环境传播与修辞的关系性问题。但是,如前所述,无论在学术还是实践层面,修辞都已经成为当下环境传播中最重要的视角之一。因此,还有必要透过现象,对这种传播取向的实质做进一步分析与阐释,以期实现对环境修辞的深度认识和全面理解。而在修辞学中,回答上述问题直接指向了修辞批评的内容。也就是说,修辞批评可以成为环境修辞进行反身性^①建构时的重要视角与路径。

一般认为,修辞批评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而真正发展于20世纪前半期的美国,并在20世纪后半期至今得到广泛关注^[45]。按照福兹的界定,修辞批评是为理解修辞过程而对象征行为和人工制品进行系统分析与考察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46](P6)}。哈特等也认为,修辞批评是为识别修辞现象的复杂性而对其进行综合有效的解读与解释的一种行为^{[47](P22)}。可见,修辞批评中的“批评”并非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指向了分析、评价、判断等意涵,其目的是为了能更全面透彻地理解修辞实践过程,并最终理解人本身^{[48](P6)}。在实践层面,西方的修辞批评家们往往通过建构具体的批评范式,比如新亚里士多德批评范式、戏剧主义批评范式、女性主义批评范式、意识形态批评范式、社会运动批评范式^[49]等,来对某一具体修辞实践的四个结构性要素^②依次展开评判。同时,这些批评范式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修辞学本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学科的理论为辅助考察视角,

^①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反身性”就一直是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领域一个热门的术语和论题。由于反身性的内涵极其丰富与多样,本文无法在这里进行展开讨论。本文这里提到的反身性指向的是对环境修辞的认识、理解和反思。

^② 这四个结构性要素分别是修辞者、接受者、修辞行为和修辞情景。

并且每一种范式都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析框架^{[49](P58)}。

但是，各种批评范式一般是对单独的、具体的修辞实践展开阐释与评论，是一种微观的研究视角。并且，每种范式往往只以某一理论视角为基点。同时，正如本文已经强调的那样，本文对环境修辞的研究并非针对某一具体的修辞现象，而是力图从整体层面把握环境修辞这样一种传播取向。因此，本文在这里意图跳出单一的批评范式的桎梏，而是从批评原则和标准的角度讨论环境修辞的批评机制。也就是说，无论采取何种范式对环境修辞实践展开评价，都应该有一些普适性或通约性的评价标准，而这些批评标准也就构成了环境修辞批评机制的具体维度。

尽管修辞批评的标准并没有一个绝对答案，但在西方修辞学界，还是有一些标准更具公认性，这三个主要的标准就是：艺术性标准、效果标准和伦理性标准^①。其中，艺术性标准，用坎布尔的话说，就是评论修辞实践是否具有“诗意”^{[50](P2)}。具体来说，就是修辞的技巧和手段（也就是语言和符号）及其特色问题。效果标准，顾名思义，即是评判修辞实践是否具有劝说修辞接受者的效果。同时，效果需要结合修辞的目的和修辞的结果来综合评估和考量。而伦理性标准则主要指向修辞实践的道德层面。也就是对由人所主导的修辞实践中蕴含的价值、观念或信仰等因素展开评价。

接下来，我们不妨以这三个标准为批评机制框架，对环境修辞作出一番分析与评价。

首先是艺术性维度。事实上，评价修辞实践是否具有艺术性指向了西方修辞学自诞生伊始就一直孜孜以求的理想之一——雄辩。尽管修辞学先驱西塞罗将雄辩定义为人类的一项基本能力，是言语流程与道德以及最高智慧相结合的产物，但在实际应用中，雄辩往往指向修辞者对说服手段有效而“合法”的应用。其中，“合法”是指对社会文化规范的遵循^{[2](P58)}。就环境修辞而言，如前所述，无论是对“凝缩符号”、“刺点”等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符号的征用，还是对“生态共同体”这一公共修辞策略的建构，都已充分展演出修辞者们高超的“雄辩”能力。在这里，我们不妨再以当下环境抗争运动中涌现出的一种新的抗争形式——表演式抗争（Performing Resistance）为例，再次从中窥探其修辞的艺术性。所谓表演式抗争，就是制造某种戏剧化的、消费性的、参与性的表演行为，从而以或悲情、或戏谑、或幽默、或讽刺的戏剧性修辞方式，来表达底层抗争诉求的一种政治行动实践^[51]。其修辞的机理是通过情感唤醒来集聚公众注意力，最终以舆论压力倒逼相关部门并激活行动。比如环境邻避事件中经常会出现的“集体散步”、“集体静坐”，就都是典型的表演实践。这种充满智慧的底层修辞策略既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机会结构^②的必然衍生品，又能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成为底层话语规避风险的“弱者的武器”。

但是，在环境修辞实践中，也有修辞者为了达到雄辩而刻意采取某些极端的修辞策略，从而使获得了修辞的有效性，也违背了基本的社会文化规范。其中，比较具有争议性的就有天启叙事（Apocalyptic Narrative）和身体抗争（Body Resistance）。所谓天启叙事，就是一种诉诸于世界末日的修辞方式，以期通过由世界末日论所引发的焦虑与恐惧来警示人们日益逼近且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4](P71)}。由于天启叙事本身具有的怀疑性和夸张性，这种修辞方式是否存在刻意建构环境风险或环境问题，从而使环境被迫成为了公众的“假想敌”或攻击对象的嫌疑？而身体抗争则是表演式抗争的极化形式，也就是一种以身体为表达媒介，在身体维度上编织抗争性话语生产的身体叙事实践^[51]。在这种由身体元素建构的修辞场景中，身体往往以自我羞辱或自我伤害等痛苦的、丧失尊严的方式呈现。曾经，在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中，身体是一个纯粹无意识的欲望据点和伦理空间；然而，在身体抗争中，身体却被迫进入剧场政治中成为了公共目光的观看对象和各种权力的意

^① 参见 L. B. Bernard, Method of rhetorical criticism—A twentieth-century perspective, pp. 17-19; R. P. Hart & S. M. Daughton, Modern Rhetorical Criticism, p34。

^② 政治机会结构就是那些能够对集体行动产生影响或制约的政治条件，反映的是社会抗争发生的宏观语境。

义赋值载体。

其次是效果维度。如前所述,环境修辞的出场正是为了回应环境传播在实践层面很难真正有效的问题。借助辞格这一“修辞结构”生产环境意义的环境修辞能够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建构说服与认同,并从中激活行动,环境传播中“态度—行为沟”的悖论得以在修辞的运用中缝合和消融。比如路易斯·S.沃伦的研究就发现,在美国环境历史上,不同的环境运动践行者正是以一种“轻柔而反复的头脑风暴”来寻找最佳的劝说策略,并且以此定义“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最终得以成功地“以环境的名义”实现了经济、健康和社会问题的深刻变革^{[52](P1)}。因此,如果从效果维度考量和评价,环境修辞似乎应是最具说服力的一种环境传播方式。

然而,笔者却认为,对于环境修辞所能达到效力也不能持绝对乐观或自信的态度,有如下的这样一些因素可能也会制约环境修辞的效果实现。

第一,环境修辞的本质是将环境理解为社会建构的产物。那么,环境到底是真实存在,还是被建构出来的?这事实上也是环境社会学中真实主义学派与建构主义学派争执不下的根源。按照真实主义者的观点,如果将环境传播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并且因此执念于环境意义的表征与再现,将会使研究者沉浸于假想的学术繁荣中而倒反忽视了如何在实践中去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这就正如有些真实主义学派的学者所批评的那样,(环境建构主义者)在这样一个世界正强烈召唤我们去改变它的时刻,却只是愚蠢地尽力去阐释世界^{[53](P30)}。

第二,如前所述,现有的环境公共领域活跃着多种与环境有关的意义生产与话语建构。各种环境话语往往彼此争夺,各自为政,甚至就连某一环境话语内部也都未能就环境的意义形成统一的意见。比如媒介关于环境的意义就呈现出(1)环境是一个受害者、(2)环境是一个病人、(3)环境是一个问题(威胁、麻烦等)、(4)环境是一种资源等^{[4](P161)}四种截然不同且自相矛盾的意涵。因此,这种话语上的多重性一方面必然导致环境修辞主体陷入到一种内部竞争而引发的过度消耗中,另一方面对接受者而言也会引起认知上的混乱。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使环境传播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反倒不利于其有效且有针对性地传播。

第三,多种环境话语的共生共存也不能掩盖一个基本现实——这就是主导环境话语仍然拥有绝对的权力。考克斯认为,在环境传播领域,当代西方社会的主导环境话语肯定了社会对富裕和进步、为经济增长与繁荣而奉献、科学与技术,以及自由主义经济、有限的政府规划和私有财产的权利等的信仰^{[4](P74)}。显然,这是一种“工业主义霸权话语”,并且与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相契合。如果按照意识形态批评范式的观点,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处于支配或核心地位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建构是一个呈现与遮蔽的过程——结果是与主导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话语的在场和相排斥的话语的缺席,那么,主导环境话语必然会构筑起一个伯克所谓的“辞屏”^①,规定、制约着人们对环境意义的认知和理解方向,从而导致环境修辞的实际效力的落差。因此,本身就支离破碎的种种环境反话语如何在主导话语的霸权中突破辞屏的藩篱,形成上文所述及的“生态共同体”,当下看来还任重而道远。

最后是伦理性维度。这样的一个修辞批评标准事实上是从修辞学之外对修辞实践进行考察。尽管修辞本身是中性的,但修辞者却可能抱有友善或邪恶的目的,因此在西方修辞批评的研究中,修辞目的的性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

事实上,在环境传播的历史演进中,随着各方参与主体愈发意识到修辞的象征性力量并纷纷有意识地运用修辞来表征或争夺自身的环境话语,环境本身的纯粹性和主体性正在不断消逝。让我们

^① 伯克认为,人们使用语言就像用镜头进行拍照一样。由于镜头下的事物或景象是一种被选择的呈现,因此词语对现实的反映也是有选择性的,词语是一种对现实的背离(deflection)。也就是说,词语在现实与人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词语的屏障,使人们无法直接接触现实本身。

再简要回忆美国环境运动史上的四次思潮：如果说早期的“环境保护主义”与“生态保育主义”运动其诉求仍然聚焦于自然环境保护这个环境传播的基本命题，环境的主体性还被置于一个相对显度的位置；那么，从20世纪六十年代起，后三次环境运动尽管仍然关注自然环境，但却明显地可以感到它们和其他社会议题或社会运动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借助环境修辞来凸显或放大附着于环境之上的其他社会议题才是各方参与主体致力于环境传播的真相。

在这里，环境俨然成为了一个跳板，一个中介，一个过程，它的终点并非在环境自身，而是指向了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层面的正义性、公平性和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看，环境本身似乎也变成了一种被征用的修辞资源。

因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当环境被征用为修辞资源时，环境是否有被利用的嫌疑？特别是按照前文提到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环境本身就具有和人类同样的道德权力。但是，在各方传播主体借用环境来解决其他社会议题的时候，我们显然没能从中体悟到一种对环境纯粹而绝对的正义关怀或道德良知。甚至有些时候，还会有极端的环保主义者为了达到保护环境或某些物种的目的，而采取故意破坏保护对象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生态破坏演示（Ecotage）^{[4](P168)}。因此，环境的主体性究竟被置之何处？究竟如何为环境的主体性负责？这些都是环境修辞在伦理性维度留下的、需要思索的问题。

由此可见，如果从修辞批评视角对环境修辞展开反身性分析，尽管修辞于环境传播而言有着积极且显性的价值，但也并非无懈可击。特别是环境修辞对社会文化规范的脱域；主导环境话语的绝对权力导致的实际效力的落差；以及当下环境本身的主体性和纯粹性正不断消逝问题，尤需引起关注和重视。

五、结 语

本文立足于修辞学相关理论，从关联机制、意义机制、批评机制三个维度入手，对当下环境传播中最重要的传播取向——环境修辞的机制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这三个修辞机制暗含着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这样一条依次递进的逻辑脉络与思路。应该说，本文的讨论从根本上回答了一个关于环境修辞的元问题——即环境传播与修辞的关系性问题。这种关系性体现在修辞学的有关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环境修辞的出场与在场；环境修辞的实质；环境修辞的反身性建构等问题。这不但有助于环境修辞在一个相对完整的修辞学框架中展开理解，也为后续同类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学理上的合法性和可行性。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对环境修辞的认识一定不能忽视环境传播作为实践或问题的中心性考察这一根本性原则，修辞只是手段或目的，因此，后续的研究更应该结合具体的环境文本展开修辞实践分析，从而使环境修辞研究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特别是运用本文中提到的各种修辞批评范式对具体的传播实践展开分析和评价便是一条不错的路径。

参考文献

- [1] 刘涛.“传播环境”还是“环境传播”？——环境传播的学术起源与意义框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7).
- [2] 刘亚猛. 追求象征的力量: 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 [3] 刘涛. 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 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J]. 新闻大学, 2009(4).
- [4] [美] 罗伯特·考克斯. 假如自然不沉默: 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第三版)[M]. 纪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5] Dobrin, S. I., S. Morey. *Ecosee: Image, Rhetoric, Mature, Albany*[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 [6] 刘涛. 环境公共事件的符号再造与修辞实践——基于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的符号学分析[J]. 新闻大学, 2014(6).
- [7] Nash, R.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4th Ed.)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8] Patterson, R., R. Lee. The environmental rhetoric of “balance”: A case study of regulatory discourse and colonization of the public[J].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997(1).
- [9] Wolfe, D. P. Sidestepping environmental controversy through a rhetoric of security; George W. Bush in Summerhaven, Arizona[J].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7(1).
- [10] Higgins, J., P. J. Naylor, T. Berry, et al. The health buck stops where? Thematic framing of health discourse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 for CVD prevention[J].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006(3).
- [11] Livesey, S. M. Global warming wars; Rhetorical and discourse analytic approaches to Exxon Mobil’s corporate public discourse[J].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2002(1).
- [12] Delicath, J. W., K. M. Deluca. Image events, the public sphere, and argumentative practice: The case of radical environmental groups[J]. *Argumentation*, 2003(3).
- [13] Schwarze, S. Environmental melodrama[J].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2006(3).
- [14] 郭小平. 环境传播中的风险修辞: “委婉语”的批判性解读[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2(5).
- [15] 刘涛. 新社会运动与气候传播的修辞学理论[J]. 国际新闻界, 2013(8).
- [16] 刘涛. 接合实践: 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 [17] 刘涛. 意指概念: 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J]. 现代传播, 2015(2).
- [18] 刘涛. 隐喻论: 转义生成与视觉修辞分析[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7(6).
- [19] 刘涛. 语境论: 释义规则与视觉修辞分析[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
- [20] 刘涛. 意象论: 意中之象与视觉修辞分析[J]. 新闻大学, 2018(4).
- [21] 刘景芳, 周佩, 高也. 转基因话语的构建、异化、与重塑——以百名诺奖获得者与绿色和平组织围绕“黄金大米”的争议为例[J]. 新闻大学, 2018(4).
- [22] 胡颖君. 邻避运动中抗争主体的修辞实践——基于连云港核事件的分析[D]. 南京: 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8.
- [23] Deluca, K. M. *Image Politics; The New Rhetoric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m, Mahwah* [M]. New Jersey: The Guilford Press, 1999.
- [24] [澳] 约翰·德莱泽克. 地球政治学: 环境话语[M]. 雪春, 等, 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
- [25] 刘涛. 环境传播: 话语、修辞与政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26] Cantrill, J. G., M. D. Masluk. Place and privilege as predictors of how the environment is described in discourse[J]. *Communication Reports*, 1996.
- [27] 刘涛. 视觉修辞何为? ——视觉议题研究的三种“修辞观”[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 [28]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修辞学[M]. 罗念生,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 [29] Bizzell, P., B. Herzberg. *The Rhetorical Tradition; Reading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 (2nd ed.) [M]. Boston: Bedford/ St. Martin’s, 2001.
- [30] Kollmuss, A., J. Agyeman. Mind the gap: Why do people act environmental and what are the barriers to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J].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002(3).
- [31] Downs, A. Up and down with ecology: The issue attention cycle[J]. *The Public Interest*, 1972(3).
- [32] Burke, K. *A Rhetoric of Motives*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 [33] [美] 肯尼斯·伯克. “修辞情景”[A]. 当代西方修辞学: 演讲与话语批评[C]. 常昌富, 等, 译. 北京: 中国科学出版社, 1998.
- [34] [德]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35] 刘景芳. 从荒野保护到全球绿色文化: 环境传播的四大运动思潮[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5(3).
- [36]Cox, J. R. Nature's " crisis disciplines ": Doe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ave an ethical duty? [J].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007(1).
- [37]Naess, A.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ical movement[J]. *Inquiry*, 1973(Spring).
- [38][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M]. 吴睿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39]Danesi, M. *Visual Rhetoric and Semiotic, Communication*[Z].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s, 2017.
- [40]Lakoff, G. , 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41]Graber, D. A. *Verbal Behavior and Politics*[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6.
- [42][法]罗兰·巴特. 明室[M]. 赵克非,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 [43]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A]. A. Ortony. *Metaphor and Thought*[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44]Foucault, M.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 [45]李科, 解学花. 西方修辞批评研究 20 年[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5).
- [46]Foss, S. K. *Rhetorical Criticism: Exploration & Practice*[M].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2004.
- [47]Hart, R. P. , S. M. Daughton. *Modern Rhetorical Criticism*[M]. Boston: Pearson/Allyn & Bacon, 2005.
- [48]Black, E. *Rhetorical Criticism: A Study in Method*[M].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 [49]邓志勇. 当代美国修辞批评理论与范式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50]Campbell, K. K. *Critiques of Contemporary Rhetoric*[M]. Wadsworth: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 [51]刘涛. 表演式抗争的剧场政治与身体叙事[J]. 现代传播, 2017(1).
- [52]Warren, L. S.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003.
- [53][加]约翰·汉尼根. 环境社会学(第二版)[M]. 洪大用, 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Rhetoric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WANG Li-na

Abstract: With constructivism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as begun to adopt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symbolic constructi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as the social use of symbols to express and compete for the meaning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This is, in fact, a rhetorical orientation, which can be interpreted as environmental rhetoric. Nowadays, environmental rhetoric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rientations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both in academic and practical aspects. Based on the rhetoric the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swer a meta-question of environmental rhetoric, nam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rhetoric. Starting with the two basic rhetoric concepts of Western rhetoric, the paper establishes the relationship mechanism betwee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rhetoric, and then explores the meaning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hetoric by analyzing "rhetoric structure", which is the rhetoric language of producing the meanings. And finally,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critical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hetoric from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artistry, effect, and ethics, so as to construct a relative and complete rhetorical framework for environmental rhetoric.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hetoric mechanism; rhetorical view; figure of speech; rhetorical structure; rhetorical criticism

(责任编辑 周振新)